



## 带着学生去劳动

严年丰/文 梁溪/图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去霞浦中学代课。从此,我就与学校的三尺讲台结下了缘,除了中间离开四年去读大学,在三尺讲台上一直做到退休。

在我参加学校工作的这些年,劳动一直是学校教育的一个内容。作为班主任,我自然也是带领学生参加劳动的带班老师。除了农忙假(上、下半年各有一次,上半年是在收麦子、油菜籽、种早稻的时候,下半年是在收割晚稻时)农业户口的学生回家劳动、吃国家供应粮的学生由学校组织起来与老师们一起到下面生产队去劳动外,每学期另有1-2周的时间在学校安排劳动。

学校组织的劳动有两块。一块是直接去下面生产大队(村)劳动,一块是在学校自己的农场里。

那时候,霞浦公社(街道)下洋地区四个大队人少地多,又种水稻又种棉花,农民们一年四季都很忙。下半年忙忙碌碌地收了棉花后,紧接着的其它收种任务(收晚稻,种植倭豆、草子、麦子等过冬植物)还很重,大批棉花秆就任其留在地里。若棉花秆不尽早拔掉,雨水一淋就会霉烂,但棉花秆又是社员(农民)家重要的燃料来源,烂了可惜。为了缓解劳动力紧张的状况,我们组织了同学们去董王、礁碇等大队,帮忙拔棉花秆。

拔棉花秆,这劳动看似简单,实则不易。花力气不说,弄不好只拔了一会儿就会手心起泡,继而皮破而流血水,疼痛难忍。经带队社员介绍,知道在拔棉花秆子时,两手必须紧紧地掐住秆子,如果不这么做,手掌在秆子上容易滑动,那更容易磨出水泡或血泡。实践后,果然有道理。有好几个同学是包着手帕或戴着手套上场的,而多数同学则是光着手掌。同学们毕竟年少力小,一天下来总有几个学生,特别是女同学会哭丧着脸。但大家都坚持了下来。

下队拔棉花秆,我们吃在生产队食堂,夜里住在社员家里(打地铺),尽管白天劳动已累了,晚上睡在地铺上,大家说说笑笑还是蛮热闹。

为了支持学校组织学生开展“学农”劳动教育,当时的杨木大队(村)党支部同意让我们去康家山南端山岗上开垦已被废弃的荒地。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劳动基地,地不多,大概不到两亩,每个班也只一分多点,但就在这一分多点的山地上,我们做起了文章。开荒、整理,秋冬季种上倭豆、大麦、马铃薯,来年春末收上倭豆、大麦、马铃薯后又种上番薯,再加上中间阶段的田间管理(松土、锄

草、施肥等),一年四季轮番不断。我们这些“知青”代课教师用自己在生产队劳动所获得的半拉子技能教学生们,比如种马铃薯,挖孔后先施上基肥(当时一般用粪肥),放上薯种,盖上细土。而薯种,可以把整个马铃薯种切成对半或再多些,只要每一份种块上都有若干个芽头即可;放薯种块时,将芽头朝上;要事先削好草皮泥,晒燥后烧成焦泥灰待用(马铃薯苗出土时塞在其根部周围)等等。有几个农家出身的学生更懂行,胜过我们这些半拉子农民,自然成了同学们的“学农”小师傅。

去山岗农地劳动,安排半天即成。如果要抬着粪肥上山,臭是免不了的,但没有人打退堂鼓;上山的羊肠小路,弯弯绕绕,抬着便(粪)桶的同学,由于便桶也高,几乎要搁在小路上,使前后抬着它的人迈不开步。师生、同学相互帮助,先上的帮后来的,大个的助小个的,男同学替女同学,奔上蹿下,嘻嘻哈哈,同学们快乐劳动的场面着实感人。当收获马铃薯或番薯时,“他掏的(马铃薯、番薯)比你多”,“我掏的比你大”,欢笑喧嚷声此起彼伏,场面煞是热闹。抬着担着回学校时,收获的喜悦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1975年底,下洋“五七”海塘基本建成,学校向围塘指挥部要来近二十亩海滩地作为“学农”农场基地。因为是刚围进来的海滩地,如果直接种棉花,盐碱性太大,必须先进行土壤改良。改良土壤的其中一个办法是将老海塘内坡上的泥土挖下来散放在新地上,因为老海塘内坡的泥土经过多年的雨水冲刷,早已淡化了,正好用来改造海滩地。就这样,除老弱教师外,全校师生齐上阵,参加到这场改良土壤的劳动中。除了少数师生用锄头在老塘边挖土、装土,女老师和力小的同学两人合抬一筐土,其余的师生则挑着土担,来回穿梭在地间。刚开始,同学们的热情很高,挑的、抬的,你追我赶,生怕落下一趟。渐渐地,速度慢下来了,老师们招呼他们的学生“慢一点,注意保持体力”,并嘱咐大家随时多休息。就这样,早上出工傍晚归,中午吃饭在地头,连续劳动了5天,改良土壤的任务基本完成。

请来农民拖拉机手翻耕土地后,整地、下种子、整苗移苗、施肥、锄草、打脑、摘花,除了“喷洒农药治虫”这项劳动不让学生参与,其它各项劳动,全校同学轮流着干。当收上来的雪白的棉花晒在学校操场上,路过的师生都会一脸喜爱,忍不住用手去摸。洒过汗水之后,收获尤为珍贵。

## 重生

江峻根

回老家时,偶遇一个童年玩伴。一别十几年,重逢很是欢喜。而偏在这时,来了个不速之客:此君一贯以“酸”闻名村内外,向来不受待见。果不其然,他对我那伙伴说:“呀,你如今混得好啦,还记得不,你10岁那年,顺过毛家3块钱。”

——这是顺手牵羊的“顺”啊!我扭头看伙伴。他说:“早忘了,难为您还记得!”他是真的忘了,因为他的脸上不起一丝涟漪,相反,某君的脸倒变得红白不定。

当年的事我记起一些来。好像是他爹让他去毛家捎个信,他见大门开着,人却不在,而桌上竟搁着3枚锃亮的大硬币……

就是这一念之差!

当时小店盛行卖一种酱鸡骨的零食,名堂很有趣,叫“乡巴佬”,对,就是买了这个。他在我们面前啃得津津有味。

然而,很快就被他爹多知道了,揪起他要去毛家。他一路挣扎,哭得很凶。毛家人呢?问了邻居和小店老板,也猜着了几分,正寻来讨个道理。半路相逢,他爹二话不说,两手一放,掏出3块钱奉还。他就是趁此时机逃回家的。

我当晚就去看他。他将自己反锁在房里,说什么也不肯见我,我想他的肠子一定都悔青了吧。

忘了是几天后,他爹连拖带拽将他拉到毛家,当着毛家人和乡邻的面,反手在他脸上结结实实扇了两个耳光。

他蒙着头跑了。他爹还站在原地。毛家人以及乡邻们个个都站得直。

我本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一起玩了。但是第三天,我又见到了那个嘻嘻哈哈的他,当然也没有小伙伴再提起那件不愉快的事。

不速之客这回识趣地离开了。我小心地问起了那桩往事。

被拖去毛家之前,他爹说:你挨了这顿打,那个过就能清了,心头上的大石头也就能放下了。他说:“我当时哪听得进!后来证明,爹是对的。”

原来这就叫担当!

逃避,并不难办;面对,才是真的难!

犯了错,隐瞒,一颗心终是悬着;被抓了把柄,更生不如死。倒是受了相应的惩戒后,才会心宽,正是解脱之时,也是尊严的重生。

三江月

总第5700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永均益吞世界

益往直前

78

其实,俄罗斯方面对这些猫腻了然于心,当觉得这些对他们有利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当他们发现无利可图,这些腐败行为实质上使俄罗斯损失更多钱,普京腾出手来整治这些黑暗行为时,存在于“灰色地带”的交易,马上就会被停止。

有一个阶段的俄罗斯,的确让人恨得牙痒痒,但随着时间推移,普京开始整顿吏治腐败时,风向就转了。警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敲诈了,对外国人也不敢那么蛮横了。等我去采访梅德韦杰夫时,感觉俄罗斯正在矫正自己,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普京再次上任总统之后,莫斯科的环境在逐渐变好。

俄罗斯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它过去曾是帝国,以后仍将会是。只要它的人民少喝点酒,哪怕再勤奋一点点,我相信,俄罗斯必将再度崛起。

俄罗斯人说:“上帝让我们为邻。”中国人则说:“远亲不如近邻。”普京总统非常赞赏这两句谚语中所

透露出来的哲理和友好。他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互为邻邦,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这不仅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与行动,也是两个伟大国家推动世界繁荣与进步的共同责任与事业。

在我看来,做俄罗斯的邻居纯属上帝有意刁难中国,在一个大国的旁边,偏偏又安插了另一个更大、凶悍且颇具攻击性的大国,这在当今人类居住的地理版图上绝无仅有。有时候,我感觉中国和俄罗斯就像一对情人,一边是瘦小精明却一往情深的小男人,另一边是高大丰腴完全掌控着小男人的大女人。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俄罗斯是可以依靠的,但不能投靠。

在这本书即将完稿之际,2014年1月,我再次得到一个采访普京的机会。一开始,我习惯性地认为,这只是和前四次采访大同小异的又一次高端访问,可没想到,第五次采访普京,却成了我职业生涯中又一个亮点,它让我连续几天在央视屏幕和各大网站上大放异彩,种种赞誉纷至沓来。而所有这些都缘于普京在接受采访时做出的一个动作。

2013年年底,中央电视台驻俄罗斯中心记者站接到俄罗斯总统府新闻局一个邀请:普京总统将于2014年1月17日,在索契会见几家俄罗斯和国际知名媒体的记者,中

央电视台作为亚洲唯一一家新闻媒体受到邀请。总统府新闻局同时要求:受邀的各家媒体派出大牌记者、主持人参加联合采访。当俄罗斯记者站将此项目报告央视新闻中心时,孙玉胜副台长决定派我去会见普京。

2014年1月15日傍晚,我只身一人登上了俄航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从莫斯科向南,飞机又飞行两个多小时后降落在了索契。索契是一个人口只有不到40万的小城市,它面对黑海,背靠高加索山脉,是俄罗斯最大的度假胜地。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从叶利钦到普京,苏联和俄罗斯的众多领导人和高官富商,都在这里建有度假别墅,每年都会定期不定期来到索契度假休闲疗养。这里就相当于美国的戴维营和迈阿密、中国的北戴河和三亚。故而,索契也有着俄罗斯“夏都”的称号。

索契也发生过许多关乎苏联和俄罗斯国家命运的悲喜剧。1964年,正在索契度假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遭到勃列日涅夫等人“逼宫”,最终黯然下台。当然,真正让中国人对索契感到亲切的,是那本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原型、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桂忠玉